

# 明清经筵日讲比较研究

谢贵安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清承明制,明清经筵日讲制度大体相同,均包含经筵大典和日讲环节,皆以程朱理学为本,以四书五经和史学为内容。然而,两朝经筵日讲制度也存在着农耕游牧、君威强弱、他学冲击等方面的差异。明朝作为农耕政权,举行经筵日讲的目的单一,就是通过宣扬程朱理学维护统治,而清室起源于游牧(游猎)民族,还将经筵日讲赋予了争夺华夏正统的意义;安土重迁的明朝将游牧与经筵对立,而游牧的清朝则无此观念;明朝经筵日讲地点固定在文华殿,而清朝则变动不居。明代皇权盛极而衰,经筵日讲官始终保持着帝师的尊严,而清代皇帝则威严高耸并以道统领袖自居,经筵日讲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颠倒过来。明代虽遇阳明心学的挑战,但效果微乎其微,而清代经筵日讲却面临汉学和西学的强势崛起,受到其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经筵;日讲;制度;明清比较

**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 (2020)05—0112—08

经筵日讲制度是中国古代针对皇帝和太子的宫廷教育制度,是皇帝或太子出席聆听,儒臣面授经史的御前教学活动。经筵日讲制度建立时间早,持续时间长,对中国最高权力拥有者的道德教育和文化培养,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皇帝接受儒臣教育的活动自汉唐就有,形成经筵日讲制度,则定型于宋代。宋代始将君臣御前教育称为“经筵”,以翰林学士等文臣担任讲官。宋代以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至冬至节为经筵讲期,称为“春讲”和“秋讲”。儒臣每逢双日入侍宫中为皇帝讲读经史。此后,经筵制度历元、明、清三代而不绝。宋代的经筵与日讲其意肤同,但到了明代,经筵与日讲细分为二,经筵属于仪式性的大典,日讲则为平日里的讲读。前者宣

示性的意义大,而后者才是平心静气学习的时机。清承明制,自然延续了明代的经筵日讲制度,也细分为经筵和日讲。明代<sup>①</sup>和清代<sup>②</sup>的经筵日讲制度都有人研究,但将二朝经筵日讲进行比较的成果尚未瞩目<sup>③</sup>,因此,本文试作比较。

## 一、清承明制:明清经筵日讲的相同之处

清承明制,明代经筵日讲制度是清代的模板,清代的经筵日讲制度基本上是仿明朝而建立。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受教者还是施教者,二朝大体相似。

第一,从形式上看,明清两朝均分为经筵和日讲。明代经筵制度包括经筵和日讲。在明代以前,

**收稿日期:**2020-07-11

**作者简介:**谢贵安(1962—),男,湖北襄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与明清史研究。

① 关于明代经筵日讲制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孟蓉《明代经筵日讲制度述论》(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萧宇青《明朝的经筵制度》(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胡吉勋《教育仪制·明代的经筵、日讲与皇帝的教育》(见赵中男等《明代宫廷制度史》第九章,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第394~413页)、晁中辰《明“经筵”与“日讲”制度考异》(《东岳论丛》2012年第7期)等。

② 清代经筵日讲制度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陈东《清代经筵制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本文关于清代经筵制度的一些基本史实或背景论述,或以此文为据,谨致谢意!

③ 许静《明清经筵制度特点研究》(《聊城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不是将明清加以比较,弄清各自的特点,而是将明清经筵制度放在一起,与宋代相比,探讨明清经筵相同的特点,与本文将明清之间的同异之处进行比较,取径不同。

历代王朝都没有将经筵和日讲明确区分的,而把经筵与日讲细分为二,则自明代始。从正统初年开始,朝廷分别制定了经筵仪注和日讲仪注,二者的区别变得十分明确。所谓“经筵”,是指注重仪式的御前讲读大典,实际上包括“经筵初讲”与“经筵月讲(会讲)”两种。明代经筵制度分春、秋两季(两个学期),春季从二月十二日起,到五月初二日止;秋季从八月十二日起,到十月初二日止。经筵初讲是每年春、秋二季经筵开始时举行的第一次经筵大典(每年有两次经筵初讲,一次是二月十二日,一次是八月十二日)。经筵月讲是春、秋二季中每月逢二(初二、十二、二十二日)举行的三次月讲(也称会讲)。日讲是春、秋两季(学期)中,除去经筵初讲、经筵月讲之外的平日讲读。

清代的经筵制度也包括经筵和日讲两部分。这显然是从明代继承来的。清代经筵也分为春、秋二季,春季一般在仲春二月,或提前在正月开讲(如嘉庆七年、八年、二十二年),或推后到三月(如康熙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四月(康熙十一年)开讲。秋季一般在仲秋八月举行,也有提前到七月(如康熙二十五年)或推迟到九月甚至十月的情况(如康熙三十年到三十三年)。<sup>[1](P33)</sup>这与明代的经筵分为初讲和月讲不同,春、秋两个学期各只举行一次,相当于各个学期的开学典礼。不过,经筵重仪式,宣示意义大于实际学习意义,这一点清代与明代并无二致。清代的日讲制度,与明朝相差无几:“日讲之礼,每岁自二月经筵后始,夏至日止。八月经筵后始,冬至日止。每日于部院官奏事后进讲。讲章缮正、副二本。以正本先期进呈。本日,掌院学士率讲官二人或三人,以副本进讲。岁终汇录成帙进御。”<sup>[2](P488)</sup>可见,明清的日讲均分为春、秋两个学期,春季从二月至夏至,秋季从八月至冬至。

第二,从内容上看,明清两朝均讲读《四书》《五经》和史书。

明代经筵日讲的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和史书。明神宗时经筵日讲所讲授的《四书》《五经》等书籍就有人作过考述。<sup>[3](P1369)</sup>明代经筵日讲重视《四书》,与程朱理学盛行有关,理学尤重《四书》,而兼重《五经》。在皇帝的经筵日讲中,讲授的顺序,也是先《四书》而后《五经》。明人黄佐专门撰写《讲读合用书籍》一篇,叙述了明代经筵日讲所用教科书的情况。他指出太祖“于凡经史百家之书无不贯通,然每自博求约,惟务得其要”,“尝令儒臣进讲《四书》,以《大学》为先,《五经》以《尚书》为先,今经筵因

之”。<sup>[4](P961)</sup>《四书》和《五经》的讲授,主要是培养帝王圣德和仁政,其实质则是培养帝王怎样通过笼络人心来实现王朝长治久安的统治之术,正如张鼐所说“帝王修齐治平之道,尽在经史”<sup>[5](P791)</sup>。明代经筵日讲的史书,有《通鉴纲目》等书。正统以后,日讲的内容“间取典谟训诰及《贞观政要》《通鉴纲目》《大学衍义》等书,日命讲说二三篇,考验历代帝王兴衰治乱存亡之由,以为鉴戒”<sup>[6](P136)</sup>。成化元年,南京刑科给事中王徽也向宪宗提出,经筵日讲应该讲授史书,建议讲《通鉴纲目》,大意是说“古昔得失载于前史,乞经筵兼讲《通鉴纲目》,无所隐讳,朝夕取为法戒”,宪宗“皆嘉纳之”。<sup>[7](P649)</sup>黄佐在《讲读合用书籍》中声称:“诸史旧皆进讲,今则惟用朱子《通鉴纲目》,若东宫则兼用《文华大训》等书。”<sup>[4](P961)</sup>可见《通鉴纲目》在英宗和宪宗时曾作为经筵讲读的内容和教材。

清朝经筵日讲的内容,与明代一样,也是《四书》《五经》和史书。《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则包括《尚书》《诗经》《周礼》《易经》《春秋》。进讲的顺序,与明一样,也是先《四书》,后《五经》。“凡进讲先书次经。”<sup>[8](P222)</sup>康熙十年(1671)二月十七日(己亥)初次举行经筵,由工部尚书王熙进讲《大学》“《康诰》曰克明德”章,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进讲《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章。可见,清代经筵是先讲一部分《四书》,后讲一部分《五经》。五十年(1711)春季经筵,康熙讲读的内容便是《四书》的“忠恕违道不远”一节,和《易经》的“九五飞龙在天”一节,同样是《四书》和《五经》并学。直到清末,依然如此。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大学士孙家鼐等在“奏进讲事宜折”中,明确提出讲官“讲《四书》《书经》”<sup>[9](P688)</sup>。

清朝经筵内容中,还有史书,一般少不了《通鉴》或其系列。康熙十九年三月初八日,圣祖曰:“外廷讲官每日进讲《书经》,故尔《通鉴》暂停。今朕欲于宫中午后讲阅《通鉴》,乃为经史并进之学。”<sup>[10](P5)</sup>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大学士孙家鼐等在“奏进讲事宜折”中还提出,讲官要讲“《御批历代通鉴辑览》”<sup>[11](P688)</sup>。可见,明清经筵日讲讲官的内容都包括《四书》《五经》和史书,特别是《通鉴》。

第三,从受教者看,明清经筵的教育对象都包括皇帝和太子。

明代经筵的教育对象,既包括皇帝,也包括皇太子,二者出席的制度性的讲读经史活动都叫经筵日讲。明代皇帝接受经筵日讲教育,从宣宗以前就开

始了,无论是太祖朱元璋、太宗朱棣,还是宣宗朱瞻基,都与儒臣一起讲读经史。英宗以后,经筵日讲制度正式确立,皇帝接受经筵日讲教育成为国家制度,历代皇帝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熹宗和崇祯帝,均接受过较为系统的经筵日讲教育。除了皇帝外,皇太子的东宫教育,也被称为经筵日讲,成为明代经筵制度的一部分。

清代也不例外,其经筵制度既包括皇帝的经筵和日讲,也包括太子的经筵和日讲。其皇帝的经筵日讲活动,从太宗皇太极时已经开始。天聪六年(1632年)九月,书房秀才王文奎上奏时宜,明确提出“勤学问以迪君心”,建议:“宜于八固山读书之笔帖式内,选一二伶俐通文者,更于秀才内选一二老成明察者,讲解翻写,日进《四书》两段,《通鉴》一章。汗于听政之暇,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sup>[9](P24)</sup>入关后,顺治帝正式确立了经筵日讲制度,历代清帝基本上接受了经筵或日讲教育。据陈东统计,顺治帝在位18年御经筵8次,康熙帝在位61年御经筵61次,雍正帝在位13年御经筵13次,乾隆帝在位60年御经筵51次,嘉庆帝在位25年御经筵24次,道光帝在位30年御经筵26次,咸丰帝在位11年御经筵9次;清入主中原267年,共开经筵192次(含临雍视学在内),平均隔年开一次。<sup>[1](P33)</sup>除皇帝外,清代的太子东宫讲学也是经筵制度的一部分。康熙二十五年(1686)奏准的太子会讲礼规定:“每岁二月、八月,驾御经筵后,钦天监择吉具题,皇太子行会讲礼”,“满、汉讲官,诣讲案前,一跪三叩,以次进讲。先《四书》,后《五经》”。同时批准的太子日讲礼规定:“日以讲官满一人、汉二人轮直进讲。正本先期送进,副本由司经局正字誊写,讲官恭奉进讲。每日早,讲官进至内左门外坐,赐茶。候内监出,引至毓庆宫悼本殿,行一跪三叩礼,进至讲案前。皇太子先讲本日书毕,满、汉讲官,以次进讲。先讲《四(子)书》,后讲《五经》,讲毕各退。日讲之期,新岁开印后,请旨开讲。退躬祭坛庙与三大节庆贺日停讲、忌辰停讲外,虽寒暑斋戒日期及封印后均不停讲。至岁暮拾祭斋戒日姑暂停。”<sup>[12](P57~58)</sup>陈东认为太子会讲、日讲基本上是照搬了康熙皇帝的经筵日讲。

第四,从施教者来看,明清经筵日讲均由儒臣担任。

明代经筵日讲讲官,都是由儒臣担任,一般需要通过科举,拥有进士出身,在翰林院、左右春坊任职,或曾有翰林院经历的官员,才有资格入选。景泰三

年高穀在提议推举经筵讲官时,便提出“于翰林院、左右春坊并各衙门内推选”<sup>[13](P4081)</sup>。经筵讲官的来源主要是翰林院和其升转机构詹府、春坊。根据明代官制,翰林院学士需要对“经筵日讲”“奉敕而统承之”。<sup>[14](P1786)</sup>直到嘉靖十一年,非翰林官员要想入选讲官,仍然必须首先获得翰林院和宫坊的资格才予考虑。<sup>[15](P3303)</sup>除了翰林院、左右春坊的资浅官员有资格担任经筵讲官外,翰林院出身且带有翰苑宫衔的国子监、六部等衙门的卿亚,也具有出任日讲官的资格。这些讲官都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儒臣。

清代也不例外,其讲官也都由儒臣担任。清代经筵日讲官除了汉官外,还有满官,但即使是满官,也必须是儒臣。清室入关后,刚举行完登基大典,户科给事中郝杰便上奏建议“首重经筵”,“请选择端雅儒臣,日译进《大学衍义》及《尚书》典谟数条”,<sup>[16](P93)</sup>明确要求以儒臣为经筵讲官。顺治十年,工科给事中朱允显提出“君德之成本于经筵”,要求“广选满汉儒臣”。<sup>[17](P562~563)</sup>十二年三月,世祖决定“举经筵日讲,以资启沃”,要求“即选满汉词臣学问淹博者八人,以原衔充日讲官”。<sup>[17](P712)</sup>这里所说的词臣,就是翰林院官员,皆为儒臣。康熙八年(1669)四月,给事中刘如汉请求“敕礼部,详考旧章。先行日讲,次举经筵,选择儒臣,分班进讲”,得到了康熙的批准,说明清代的经筵日讲官都是儒臣。这显然是受到明代的深刻影响。

从以上四点可见,明清经筵日讲制度基本一致,证明了清承明制之实,清朝的经筵日讲制度,与明代一脉相承。

## 二、农牧之别:明清经筵日讲的不同烙印

明清经筵日讲制度虽然一脉相承,框架基本相同,但由于农耕与游牧(游猎)民族之间的差异,被打上了不同的烙印。这些不同,包括推行经筵日讲的意义,经筵日讲所受游牧影响的压力,经筵日讲的地点等等。

第一,明清经筵日讲制度设立的意义不尽相同。明朝推行经筵制度,只是为了提高皇帝和太子的文化水平,通过强化儒学来加强自己的统治;而作为游牧(游猎)民族的清室,其大力推行经筵制度的目的,除上述之外,还有加速“汉化”,去除身上被人加上的“夷狄”符号的意义。

中国是由农耕和游牧两大民族形成的,居于中原的农耕民族自称为“华”(或“汉”),而散居四周的游牧民族(少数民族)则被称为“夷”(或“狄”“戎”



“蛮”)。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让中原农耕民族深感自豪,而游牧民族则有所自卑。当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就大力推行汉化,使自己在文化建设上做得比汉族统治者更好,以此抵销文化上的自卑。韩愈说过:“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sup>[18](P17)</sup>这对进入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是一个莫大的鼓舞。清朝入关后,实行右文政策,祭拜孔子,推崇儒教,修纂规模浩大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同时,在经筵日讲上,也不遗余力地推行,造成一种皇帝好学,是儒家文化代表的形象。

明代皇室出身汉族,虽有人曾怀疑朱元璋出身回族,但并无过硬证据。作为汉民族,朱明皇室接受经筵日讲制度,顺理成章,仅具有高扬儒学旗帜,引领意识形态风向,同时提高皇帝、太子文化水平的意义。而对于出身满洲的清朝皇室而言,接受经筵日讲制度,除了明代皇室所具有的上述意义之外,还蕴含着更加深刻而广泛的意义,那就是接受“汉化”,抵销“夷狄”的讥讽,弥合满汉畛域,让汉族大臣心悦诚服,为巩固其统治服务。因此,清廷便大力接受汉族文化,继承明朝的经筵日讲制度,通过经筵日讲制度强化儒家伦理,建立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以为其上层建筑(君主专制)服务。

第二,明清经筵日讲制度,在农耕和游牧两种不同文化氛围中,执行的评价标准和所受到的压力并不相同。

在农耕社会氛围中,经筵向学与游畋玩乐是相悖的。明代皇帝常常因为游畋玩乐,影响经筵日讲,而受到大臣的严厉批评。<sup>[19]</sup>明武宗“倾耳于太监丘聚、魏彬、马永成之流”,“陷其术中而不悟”,故“恣意于驰射狩猎之乐,而国政圣学则怠于究心”。工科给事中陶谐要求严肃“查究日逐侍从游逸诸人如聚等,数其误国之罪,告于先帝,罪之弗赦”,同时“别选端静之人以充侍从”,在“痛戒逸游”后“如旧日讲,亲君子而远小人”。<sup>[17](P433)</sup>因此,明朝的畋猎驰射与经筵日讲是相悖的事物,为儒臣们所严厉禁止。

然而,清朝出身于游牧(游猎)民族,游畋活动是其民族特性。清朝经常宣誓要保持其“骑射”传统,因此大力推行游猎活动,为此不惜影响经筵日讲,甚至改变了从明朝继承下来的经筵制度。顺治十一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赵开心上奏,强烈要求世祖“经筵宜御”,同时指责皇帝嗜好畋游。世祖览奏后十分愤怒,严辞反驳:“至本内云:屏斥畋游。朕思祖宗立国以来,讲武习兵,安不忘危。开创之际,何得懈弛

武事。况深居高拱,乃明季陋习,岂可重行!”并称“赵开心此奏,实常谈浅见。风宪大臣,果知朕过,即当直言无隐,何得泛为条陈,沽名塞责,殊负朕委任之意!”<sup>[17](P631)</sup>以畋游误经筵的批评,在明代是一种利器,但在清代却没有了用武之地,因为畋游本身就是清朝的尚武传统。据《榆巢杂识》记载:“每岁经筵进讲,例春秋仲月举行。近以秋猕木兰,惟行于春仲。”<sup>[9](P221~222)</sup>因为要举行秋猕,秋季经筵已经停止,故而乾隆以后,历代皇帝一般都只在仲春二月举行一次经筵,春、秋二季的经筵制度遭到破坏。

第三,明清经筵日讲的地点,也受到了农耕、游牧文化的不同影响,而出现不同的情况。

明朝皇室起于陇亩,其文化具有农耕民族的基本特色,就是追求稳定,场所固定。明代经筵日讲的授课地点,一般固定不变,多在宫中文华殿举行。无论是皇帝还是太子,都在文华殿讲读。

皇帝的经筵日讲一般都固定在文华殿。洪武十八年九月,朱元璋御文华殿,“命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讲《周易》”<sup>[4](P958)</sup>。宣德二年,宣宗“御文华殿”,听讲臣讲课;三年,再御文华殿,听“儒臣讲《舜典》”。<sup>[20](P127~128)</sup>四年,他又驾临文华殿参加讲筵,与廷臣谈论典谟。<sup>[21](P52)</sup>英宗复辟后,准备把太子讲读从文华殿中移出,而将该地点作为皇帝的专用场所,不过并未实行。孝宗时举行经筵仪式,“次日即御文华殿进讲《尚书》《大学衍义》”<sup>[22](P204)</sup>。隆庆元年八月,穆宗“初御文华殿日讲”<sup>[23](P768)</sup>。明代参加经筵日讲时间最长的神宗,也是御文华殿讲读。他在张居正的奏疏上朱批道:每月定以三六九日上朝听政,其他时间“只御文华殿讲读”<sup>[24](P21)</sup>。天启七年四月,以贪玩出名的熹宗,也“御文华殿讲读”。明朝末帝思宗,直到崇祯十五年八月仍然“御文华殿日讲”<sup>[25](P260)</sup>。可见,明代皇帝从太祖开始,直到崇祯帝为止,都在文华殿举行经筵日讲。明世宗朱厚熜虽然一度将讲筵移至西苑无逸殿、鹵风亭,但他是受道教归依自然的影响,在山水间举行讲筵,“进讲《十月》诗、《无逸》书各一篇”,有现场教育之效。这与清代经筵日讲地点变动不居受游牧风气影响,从本质上来说并不相同。

明代皇太子也固定在文华殿讲读。早在洪武二十六年,明太祖就“遣秀才张宗濬等随东宫官入值文华殿,讲筵毕,诵说民间疾苦,往古良懿”<sup>[26](P812)</sup>。朱棣从永乐四年(1406)开始营建北京,然后建设文华殿和大本堂,作为宫廷教育的场所。大本堂废弃<sup>[27](P814)</sup>后,太子的经筵日讲一直都在北京宫中的

文华殿举行。英宗复辟后,“以东宫读书多在文华殿”,打算将文华殿作为皇帝专门的经筵日讲场所,而把太子讲读场所移到武英殿的左廊,但最后仍然是留在文华殿,只不过是把讲读地点移到东厢房去了。此后弘治十一年制定的《每日讲读仪》规定:皇太子至文华殿升座后,“通事舍人以书案进,内侍展书,侍读官进读,读毕,侍讲官进讲,讲毕,通事舍人撤案”<sup>[28](P111)</sup>。由此可见,太子经筵日讲的地点依然不出文华殿。<sup>[26](P451~454)</sup>

清代则不一样,其经筵日讲的地点变动不居,显然是受游牧(游猎)风气影响的结果,具有浓厚的游牧(游猎)文化色彩。清朝入关后,世祖也开始像明朝那样,准备把经筵日讲的场所定在文华殿,但文华殿迟迟修建不起来。文华殿修成后,康熙、乾隆、嘉庆、道光等帝均曾在此举行经筵或进讲<sup>[29](P273)</sup>,但并非固定不变。顺治时皇帝的日讲场所变动无常,除了弘德殿外,有时也在瀛台或南苑,或在养心殿,或在景山臻禄阁。康熙日讲地点也很多,一般是在弘德殿、懋勤殿或乾清宫。郊游或外出时,行宫(如南苑前殿、瀛台等)也成为日讲场地。<sup>[1](P48)</sup>例如顺治十二年秋,世祖幸景山臻禄阁,召日讲官五人各讲经书一篇,赐坐,又命王熙、曹本荣每日进讲于弘德殿,冬,于南苑日讲。顺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王熙奉召入瀛台进讲经史各一段。经筵日讲场所一会儿景山,一会儿瀛台,一会儿南苑,反映出清室延续的迁徙不定的游牧(游猎)民族生活特点。

清代皇太子的经筵日讲,地点与皇帝不在一处,且亦多有变动。康熙时“太子会讲礼”中规定,皇太子“恭诣传心殿祇告礼成,升主敬殿座”,即在传心殿举行仪式,在主敬殿讲读。“太子日讲礼”规定,将太子“引至毓庆宫惇本殿”举行讲读。<sup>[12](P57)</sup>讲读场所亦不固定。

由上可见,明清皇帝和太子的经筵日讲,由于农耕与游牧(游猎)文化的不同,在讲课地点上呈现明显的差异,明朝地点比较固定,而清朝则变动不居。

### 三、君威强弱:明清经筵教学关系之不同

虽然明清都属于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强化的巅峰时期,甚至明朝还是这拨皇权强化的始作俑者,然而,将明清两朝的皇权进行比较,还是可以发现明朝的君权强化程度明显低于清朝。明朝是太祖时期经过胡蓝之狱进行恐怖清洗后建立的皇帝集权,但这种运动式的集权后继乏力,到明代中后期便已成强弩之末,用儒家思想和理学精神武装起来的

儒臣们,敢于对皇帝直言强谏,皇帝越打压,儒臣声望越高,皇权的威严不复如初。清朝是通过南书房和军机处的相继设立,将权力集中到皇帝之手,虽没有运动式的显目,但却导致皇权至高无上。清代很少出现像明代雒于仁那样敢骂皇帝酒色财气的谏臣。加之满汉之畛域,汉臣往往将自己视为外人,不敢直言强谏。在此背景下,明清的经筵日讲课堂上,出现了教学者儒臣和受教者皇帝之间态度和气势的巨大差别。

明代经筵日讲课堂上,虽然保持着君主神圣的礼仪,讲官不能坐讲,只能立讲,但皇帝对讲官仍然以师道待之。明代许多皇帝和太子都承认讲官的老师地位,直接称呼其为“先生”。“正统以来,经筵每日讲毕,上必曰:‘先生每吃酒饭。’”<sup>[30](P1290)</sup>明宪宗面对到东宫时的讲官刘珙时,尊敬地称其为“东刘先生”<sup>[31](P165)</sup>。孝宗“初即位,雅重讲幄儒臣,呼‘先生’而不名”<sup>[32](P724)</sup>。神宗不仅称张居正为先生,而且将经筵讲官也尊称为“先生”。如陶大临为经筵日讲,首讲《大学》,神宗“器重之,数称‘先生’而不名”<sup>[33](P73)</sup>。直到崇祯朝,举行经筵日讲时,思宗称“‘先生们来’,讲官始入,讲毕,上复宣‘先生们吃酒饭’”<sup>[34](P51~52)</sup>。看来,素以严苛闻名的思宗,也是把讲官称作老师的。崇祯十五年正月元旦,思宗御殿朝贺毕,对担任经筵讲官的阁臣们说,“古来圣帝明王,皆崇师道,今日讲官称‘先生’,犹存遗意,卿等即朕师也,敬于正月端冕而求”,并亲自面向阁臣一揖。阁臣们连称“菲才不敢当”。思宗说:“先生正是朕该敬的!”<sup>[35](P196)</sup>讲官升迁也较他人为速,“日侍讲幄,久效勤劳,比之别衙门办一事、效一职者不同,稍加优厚,亦不过为”<sup>[15](P777)</sup>。

讲官们也以“帝王师”自居,在程朱理学影响下,秉持“道高于君”的理想,坚持真理。在他们看来,明朝皇帝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sup>[35](P94)</sup>。明代讲官们甚至在课堂上也敢于面折皇帝,而后者也只得容忍。世宗“待讲臣厚,即吴惠、郭维藩讲章有所规讽旨令条列,竟亦不之罪也”<sup>[36](P103)</sup>。讲官在经筵日讲中,敢于高举道旗,以师自居,直接纠正皇帝的错误和无礼行为。崇祯时,文震孟“在讲筵,最严正”,当时大臣多遭逮系,文震孟讲《鲁论》“君使臣以礼”一章时,“反复规讽”,崇祯“即降旨出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于狱”。一次经筵时,“帝尝足加于膝,(文震孟)适讲《五子之歌》,至‘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视帝足。帝即袖掩之,徐为引下”,当时人称他为“真讲

官”。<sup>[15](P6497)</sup>这说明明代经筵日讲官的帝师身份一直得到尊重,而皇帝则仍然以弟子自居。

然而,清代经筵日讲课堂上,情况不太相同,讲官们小心翼翼,皇帝却趾高气扬,甚至将经筵日讲的制度做了根本性的篡改,将经筵日讲的目的——皇帝接受教育,改成了“君臣交儆”,即皇帝与臣下(包括讲官)一起接受教育;甚至增加了突出皇帝高见,训谕臣下的“经筵御论”环节,师生身份颠倒过来。

“君臣交儆”的出现,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初二日,当时经筵讲官、翰林院学士牛纽及张玉书、侍读学士傅腊塔启奏经筵进讲题目。康熙下谕旨道:“经筵关系大典,自大学士以下,九卿詹事科道俱侍班,所讲之书,必君臣交儆,上下相成,方有裨于治理。向来进讲,俱切君身,此后当兼寓训勉臣下之意,庶使诸臣皆有所儆省。”<sup>[37](P136)</sup>从此,经筵由针对帝王的教育,变成了面对群臣的“君臣交儆”的训话,“经筵的性质与作用产生了变化”<sup>[1](P20)</sup>。康熙五十年(1711)春季经筵,圣祖变学生为讲师,亲自讲《四书》“忠恕违道不远”一节,《易经》“九五飞龙在天”一节,讲官成为虚设,且变身为学生了。这与明代经筵日讲制度颇为不同。其实,早在康熙十四年,圣祖就已经在转变身份,向主讲方向迈进。他宣谕道:“日讲原期有益身心,增长学问。今止讲官进讲,朕不覆讲,但循旧例,日久将成故事”,决定“嗣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乃覆讲。如此互相讨论,庶几有裨实学”。<sup>[37](P702~703)</sup>从“覆讲”发展到“亲讲”,于是便有了康熙五十年圣祖亲自粉墨登场,讲授《四书》的情形。虽说这是为了“互相讨论”和“君臣交儆”,但实际上成了皇帝对讲官和大臣的训导。这为此后皇帝的“经筵御论”奠定了基础。

“经筵御论”的出现,始于雍乾之时。在经筵举行中,直讲官讲四书、五经之后,皇帝都要发表“御论”。这些“御论”并没有深刻卓越之见,多属大言套话,其实是皇帝为了表明自己的高见,向君臣所作的训话。清世宗对皇帝议论进入经筵制度的程式问题作过反复探讨。高宗将乃父的经筵御论尝试予以定型。乾隆三年(1738),高宗首次举行经筵大典,当讲官进讲四书之《论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章后,乾隆宣讲御论道:“政刑者,德礼之先声;德礼者,政刑之大本。舍德礼而求政刑,必成杂霸之治;即政刑而寓德礼,乃见纯王之心。一尔二、二尔一者也。若云德礼之外别有所谓政刑,则非圣人垂教之本意矣。”然后由讲官进讲五经之《尚书》,讲毕,高宗同样宣讲一大段御论。皇帝宣讲御论时,讲官

暨侍班官员皆跪着聆听。<sup>[38](P31)</sup>正如陈东所言,雍乾嘉时期“‘经筵御论’成了经筵的中心,经筵已经完全蜕变为帝制宣传的工具”<sup>[1](P10)</sup>。

清代君权的强大,还使得他们修改了经筵日讲制度,将日讲制度早早废黜。圣祖从康熙十五年开讲日讲学习,至康熙二十五年便下令停止。此后,清代经筵制度就只有经筵仪式,没有日讲环节。其实日讲才是皇帝或太子学习理学和文化的最有效的讲筵形式。道光三十年,即位伊始的咸丰帝打算恢复日讲旧制度,但因有人反对而作罢。同治、光绪年间,一度在养心殿或勤政殿恢复了日讲,但既无经筵仪式,亦无固定学期,日讲时间也视两宫皇太后心情而定。宣统元年(1909),尝恢复大臣分班轮讲的日讲制度,旋因帝国灭亡而终止。这与明代经筵日讲制度虽然时断时续,但基本制度始终未变的情况并不相同。

综上所述,明清君主权威虽皆在高位运行,但前者不如后者,故明代经筵日讲制度一直呈讲官为师,君主为生的状态;而清代经筵制度则因君主权威更为强大,而形成“君臣交儆”和“御论训诫”的模式,师生关系颠倒了过来,甚至因君主个人的决定,便废止了日讲制度。清代君主之所以对经筵日讲严密控制,与他们既争夺政治上的“治统”,又争夺文化上的“道统”有关。<sup>[34](P430)</sup>清室认为,只有控制经筵,才能改变皇帝为生、儒臣为师的局面,从而获得“道统”上的优势,塑造“道由清出”的形象,以便更有利地统治中国。

#### 四、冲击大小:明清经筵内容所受其他学术影响不同

明清经筵日讲制度均处在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然而,明代经筵制度的学术环境基本未变,故未受其他学术思潮的干扰和影响,一直以四书五经为讲本;清代经筵制度虽然也处在程朱理学的统治下,进讲以四书五经为主,但却先后受到了汉学和西学的强烈冲击和影响,讲课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

理学首重四书,次重五经,故明代经筵日讲中也是先讲四书一章,后讲五经一章。讲课内容一直以程朱理学的伦理观念为重心。正德嘉靖之际,王阳明心学兴起,在士大夫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初入北京的世宗也是依靠阳明弟子及心学理论的支持才赢得了“大礼议”之争<sup>[39]</sup>,但在议礼新贵张璁、霍韬等主持的经筵日讲中,并未发现宣讲心学的内容。作为王守仁弟子的穆孔晖,在担任经筵讲官时,



他很想将心学思想灌输给世宗皇帝和侍筵的朝臣,但却并未达到应有的效果,因而叹曰:“鉴照妍媸,而妍媸弗著于鉴,心应事物,而事物弗著于心,如鸟游空自来自去。”他“不以文字华藻给口耳之求,然经筵启沃,朋辈往复,往往疏往哲之奥言,明群生之理性,令闻者耸听,玩者心开”,特别是“至上(指世宗)前反复开谕,务详于君子小人之际,其心冀以自尽,而要人忌之日甚。虽踞师席,晋清卿,非不尊显,而道不行于朝”。<sup>[40](P546)</sup>直到明末,经筵日讲都在讲授以四书五经为尚的程朱理学。

清代经筵日讲虽然也是先讲四书后讲五经,以程朱理学为主要内容,但在乾隆嘉庆时期,却受到了新兴的汉学的影响,其经筵日讲打上了汉学的烙印,晚清时,又受到西学的影响,被赋予了西学色彩。

清代乾隆时期,以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兴起,直接威胁到谈性说理的程朱理学之正统地位。高宗在经筵上当众对地位崇高的朱子学进行抨击。起初,高宗也是理学的信徒,号召众臣学习理学,但乾隆二十年(1755)前后,他开始在经筵御论中批评和诋毁朱熹。二十一年仲春经筵,直讲官伍龄安、蒋溥进讲《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二句时,高宗在御论中指出:“朱子谓‘天命谓性,修道谓教’,二字不同。予以为正无不同耳。”直接表明自己与朱熹意见不同。三十九年仲春经筵,直讲官永贵、王际华进讲《论语》“仁者先难而后获”一句。乾隆在御论中声称,“董仲舒正谊明道之论,略为近之。而朱子举以为不求后效,又以为警樊迟有先获之病,未尝申明告颜子之意”,指出朱熹的解释不对。五十四年仲春经筵,直讲官德明、刘跃云进讲《论语》“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一节时,高宗在御论中指出:“司马迁增之以‘学之’二字,朱子亦随而注之,则胥未知乐,且未知夫子矣”,“而朱子且申之以九十一日知味之说,反覆论辨不已。吁!其去之益远矣”。<sup>[41](P884)</sup>高宗在经筵御论中对朱熹学说的质疑,打破了“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禁律,推动了汉学的隆兴和宋学的衰落。陈祖武指出:“清高宗选择崇奖经学、立异朱子的方式,把学术界导向穷经考古的狭路之中。”<sup>[42](P307)</sup>道咸之际,唐鉴、曾国藩等理学名臣试图再次推进程朱理学复兴,光绪三十三年(1907)也一度恢复经筵日讲,但由于西学东渐,理学终于无力回天。<sup>[1](P90)</sup>

清代以程朱理学为主要内容的经筵日讲,还受到西学的冲击。圣祖自康熙二十五年后,对传统经筵感到厌倦,转而学习传教士传来的西学,如天文

学、几何学、静力学、西洋乐理、哲学、解剖学等,当时先后有11人担任圣祖的宫廷教师。<sup>[43]</sup>清末,西学再次强劲输入,对经筵日讲的内容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光绪三十三年日讲恢复之时,慈禧太后与德宗每日视朝后,在勤政殿参加日讲,所讲内容仍是经史和国朝典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增加了“各国政略”一门。讲官为此还准备撰写《西史讲义》,并在《叙例》中解释道,“欧美列邦虽云僻远,而梯航辐凑,浸成牙错机张之势,且其政治艺学,效著富强,又多足我所取资。是彼土外史之籍,固亦当世得失之林也”,并附上《拟编西史讲义目录》,其中有“新航路之发明”“新大陆之发见”“尼特兰之独”“俄土战争”等。<sup>[44](P3~50)</sup>宣统元年(1909),经筵日讲内容已不再拘于经史国故,“分为八门,多偏重西学”<sup>[45](P97)</sup>。宣统元年闰二月皇帝宣谕:“昨日吴士鉴所进《西洋通史讲义》尚属可观。嗣后进讲诸臣,务当于各书中有关一切新政宪法之处,详慎采择,剴切敷陈,裨有益于朕殷殷求治变法之至意,断不可摭拾空言谬论,无补时艰为要。”<sup>[46](P163)</sup>传统的程朱理学在经筵日讲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由上可见,明清经筵日讲制度由于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同,受到程朱理学以外的其他学术冲击不同。明代虽然有心学的兴起,但未对经筵日讲造成太大的干扰,而清代则由于汉学和西学的崛起,对经筵日讲的主要内容程朱理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这是二朝之间的又一点不同。

## 五、结语

总体上来说,明清经筵日讲制度大体相同,均包含经筵大典和日讲环节。明清皇帝也都出现过厌学现象,经筵日讲时断时续,但基本上都延续下去,直到王朝崩溃。明清两朝经筵日讲内容也基本相同,都是以程朱理学为本,以四书五经和史学为内容。

然而,明清两朝的经筵日讲制度也存在着一些差异。首先是农牧差异。明朝属于农耕政权,其经筵日讲延续旧制,推崇理学,以助自己的政治统治;而清朝起源于游牧(游猎)民族,即古代所称的“夷狄”,为了洗去这层身份,其经筵日讲被赋予了争夺华夏正统的意义,试图通过汉化的努力,达成“夷狄入于中国而中国之”的局面。由于农耕民族重视劳作而排斥游乐,因此明代舍经筵而趋游畋的皇帝都受到儒臣的劝谏和攻击;而游牧(游猎)民族无此观念,甚至以游畋骑射为传统,故清代皇帝舍经筵而趋游畋时,儒臣和讲官们的指责就显得无力而被轻易

驳回。由于受农耕定居文化的影响,明朝的经筵日讲地点比较固定,无论是皇帝还是太子,都在宫中文华殿举行;受游牧(游猎)文化影响,清朝的经筵日讲地点变动不居,除延续明制有时在文华殿举行外,其他时间或在宫中,或在禁苑,或在此殿,或在彼殿,随心所欲,变化多端。其次,由于明清皇权集中程度不同,经筵日讲的形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明清两朝虽然都处在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的巅峰时期,但明代皇权盛极而衰,大臣敢于直言强谏,因此经筵日讲官始终保持着帝王师的某种尊严,皇帝也自屈于弟子之列;而清代皇权则威严高耸,满族大臣自称奴才,汉族大臣自称微臣,不敢面折廷诤,因此经筵日讲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颠倒过来,皇帝覆讲之后亲讲,甚至产生“经筵御论”的形式,由皇帝对讲官和 大臣大发议论,大肆训诫,清帝成了道统的秉持者,以此维护其治统。再次,由于所处学术环境的差异,明清经筵日讲的主题程朱理学受到干扰和影响的强度不同。明代经筵日讲虽遇阳明心学兴起,似乎有机会影响世宗朝的经筵日讲,但效果却微乎其微;而清代经筵日讲却面临汉学和西学的强势崛起,对经筵主题程朱理学先后产生了重大的干扰和影响。

参考文献:

[1]陈东.清代经筵制度研究[D].山东大学,2006.  
[2]清会典事例[A].续修四库全书(第 812 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朱鸿林.明神宗经筵进讲书考[A].饶宗颐.华学(第九、十辑)[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黄佐.翰林记[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96 册)[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张鼎.宝日堂杂钞[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  
[6]明孝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7]储耀.陕西布政使司右参议王公徽墓志铭[A].焦竑.国朝献征录[C].台北:明文书局,1991.  
[8]赵慎畛.榆巢杂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9]罗振玉.天聪朝臣工奏议[A].潘喆,孙方明,等.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10]清德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十九年南书房记注(一)[J].历史档案,1996(3).  
[12]大清会典则例[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25 册)[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3]明英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4]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5]明世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6]清世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7]明武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8]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9]谢贵安.论明代儒臣与宦官在皇帝娱乐中的影响和较量[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6).  
[20]俞汝楨.礼部志稿[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98 册)[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1]臧懋循.负苞堂文选[A].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 168 册)[C].济南:齐鲁书社,1997.  
[22]尹守衡.皇明史窃[A].续修四库全书(第 317 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3]吴瑞登.两朝宪章录[A].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 16 册)[C].济南:齐鲁书社,1996.  
[24]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25]明内廷规制考[A].丛书集成新编(第 29 册)[C].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26]谢贵安,谢盛.明代宫廷教育史[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  
[27]查继佐.罪惟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28]申时行,等.大明会典[A].续修四库全书(第 790 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9]章乃炜,王蔼人.清官述闻(初编、续编合编本)[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  
[30]尹直.斋斋琐缀录[A].邓士龙.国朝典故[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1]焦竑.熙朝名臣实录[A].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 107 册)[C].济南:齐鲁书社,1996.  
[32]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A].续修四库全书(第 533 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3]王世贞.弇州续稿[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83 册)[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4]谢贵安.中国史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35]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6]黄景昉.国史唯疑[A].续修四库全书(第 432 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7]清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8]清高宗实录(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9]谢贵安.王阳明心学与“大礼仪”复杂关系试析[A].明史研究(第 16 辑)[C].合肥:黄山书社,2018.  
[40]焦竑.焦氏澹园续集[A].续修四库全书(第 1364 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1]清高宗实录(一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2]陈祖武.从经筵讲论看乾隆时期的朱子学[A].袁行需.国学研究(第 9 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3]谢景芳,邱伟.康熙帝与外籍教师团[J].满族研究,2003(2).  
[44]张毅君.为光绪帝进讲“各国政略”稿[A].近代史资料(总 104 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5]胡思敬.国闻备乘[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46]宣统政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7.